契丹文"山"、"山"考

——契丹文字构造规律新探

黄振华

一、引言

史载契丹文字有大小两种：契丹大字创制于辽太祖神册五年（公元920年），突吕不、耶律鲁不古二人主其事；契丹小字可能创制于天赞初年，太祖之弟迭剌主其事。金灭辽后，亦仿契丹制作女真大小字，但契丹字仍沿用至金章宗明昌二年（公元1194年）始废。现今所见辽金时代契丹文墓碑、铜印、铜牌、铜镜、鱼符、玉盏等物，铭文亦有大小字，足证史籍记载不误。就目前所知，契丹文碑铭年代确凿者以辽统和四年（公元986年）《耶律延宁墓志》（契丹大字）为最早，而以金天德二年（公元1150年）所谓《肖仲恭墓志》（契丹小字）为最晚①。

自1922年在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白塔子发现辽陵帝后哀册迄于现在，六十年来中外学者致力于考释契丹语文者颇不乏人，成绩最著者首推我国学者罗福成。他所推定的契丹小字帝号、年号、干支、年月日等，至今仍是进一步释读契丹语文的重要阶梯②。但是，由于出土契丹文字遗物为数尚少，又加释读方法欠妥，我们今日依旧不能通解契丹文字。在我看来，至今契丹文字的解读仍然处于猜测阶段，仍然是"二十世纪之谜"。

日本学者村山七郎在《契丹文字的解读方法》（见1951年《言语研究》17／18第47—70页）一文中，肢解契丹小字笔划，以之比附突厥卢纳文字字母，断言契丹小字系仿制突厥卢纳文字。这篇文章后来又发表在1957年出版的《第22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会议录》（proceedings）第2集（386—398页），改题为《契丹文字与突厥卢纳文字的关系》，一时颇获盛誉，日本学者田村实造曾说村山七郎的解读可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相媲美。其实我国史有明文，契丹字乃是增损汉字"隶书之半"而成，这表明契丹作为我国古代兄弟民族之一，深受汉文化影响，也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契丹大小字中都有不少与汉字字形相同或相近，颇似日本利用汉字的情况，与突厥卢纳文字是毫无瓜葛的。对于村山七郎的所谓解读，有些日本学者如山路广明、长田夏树等人就不表赞同，甚至田村实造后来也表示怀疑。

值得称道的倒是山路广明的见解。他根据多年研究女真文字和契丹文字的实践经验，确认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都是仿制汉字而成，并且试图运用满蒙语言解出女真文字和契丹文字的音值。不过由于不曾找出它们与汉字的真正联系，加之类比方法使用不当，山路广明终未能解通契丹文字③。

苏联在60年代之初也曾有人尝试解读契丹文字，后来并曾试图采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解读。他们在契丹文字远未解读成功的条件下，大谈所谓契丹语形态学、结构学④，人们不禁要问，其价值究有几何。至于匈牙利李盖第（Ligeti）、西德门格斯（K. Menges）、德尔费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G. Doerfer) 和福赫伯 (H. FranKe)等人的研究，不过掇拾我国史籍记载的少量契丹语词讨论其词源而已。

建国以来，我国的文物考古工作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尤其是近十年来，契丹大小字墓碑续有发现，为研究契丹语言文字和辽金政治社会文化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与此同时，我国契丹文研究也取得了进展。1977年9月《内蒙古大学学报》第4期刊出“契丹小字专号”，发表了《关于契丹小字研究》一文，1978年《考古学报》第3期转载了此文的节略（题名《契丹小字解读新探》）。这项研究引起了国际注意，对于我国古代民族文字的研究，毫无疑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然而根据所解读的契丹小字音值，我们仍旧不能读通一句契丹语，且不说解读的步骤有循环论证、不能自圆其说的弊病。试以契丹文的“山”字为例，前人释“山”为“戊己”，这是十分正确的。“契丹小字专号”既释此字为“戊己”，又释为“金”⑤。这便不能不令人发生疑问：“戊己”与“金”有何关系？尽人皆知“戊己”当配“土”而不配“金”。若此契丹字“山”不表示“金”的意思，那么“契丹小字专号”所释出的契丹文“大金国”、“大金皇弟”等未必可靠。所谓“大金国”、“大金皇弟”的释读既不可靠，那么所释《郎君行记》后文“都统经略郎君……”等等一连串契丹字，又怎能令人信服。由此可见，这个契丹字“山”的释读是解通契丹文字的关键。本文即试图解释契丹文墓碑几个含有“山”字的帝号和名称，以求找出契丹文字的造字规律及其与汉字的关系。限于作者学植浅薄，所论不免有错，敬希方家指正⑥。

二、释契丹文“山”（土）——兼论契丹干支纪年

契丹文“山”字目前已确知其意义者，仅见于重熙二十四年（公元1055年）《兴宗皇帝哀册》、乾统元年（公元1101年）《宣懿皇后哀册》、天庆五年（公元1115年）《故耶律氏铭石》；此字用于干支纪年，义为“戊己土”。前人将金天会十二年（公元1134年）《郎君行记》第2个契丹字“山”误释为“金”，而以对应的汉字为“金”作证。数十年来人们对此深信不疑，竟致作出所谓“戊己金”的结论。至于此字音读如何，历来无说。此外，若以契丹字“山”表示“金”，势必也将清宁三年（公元1057年）《肖氏墓志》含此“山”字的帝号释为“天金皇帝”。然则遍检史籍无此帝号，其错谬自不待言。

由此可见，契丹字“山”除用于干支纪年表示“戊己土”之外，当别有含义，不当表示“金”的意思。那么，这个契丹字“山”究竟还有什么别的含义呢？

先从契丹字“山”用于干支纪年（表示“戊己土”）说起。

据李焘《资治通鉴长编》引宋绶《行程录》：契丹谓“山曰讷都”。汉字“讷都”古音nuet-tuo。兹假定：1、契丹字“山”借用汉字“山”；2、契丹人用契丹语“讷都”读汉字“山”；即以“讷都”为字音；3、契丹字“山”由此获得一个固定音值为“讷都”。不难看出，这种情况相当于日本借用汉字的“训读”。

现在来进一步说明契丹字“山”（音“讷都”）用于表示“土”。众所公认，契丹语属于阿尔太语系。就作者所知，阿尔太诸语言仅有蒙古语“土地”一词的音值与汉字“讷都”读音相近。试比较《元朝秘史》nuntuh（营盘、牧地）、古典蒙古语nutug（土地、地方、家乡）、莫卧儿语nutug>nuntug（土地、家乡）、布里亚特蒙古语nutag（土地、地方）、喀尔喀蒙古语nutag（家乡、地方、领土）、我国境内蒙古语nutag（土地、地方、家乡）。《马可波罗游记》记述的Natigay——Nacigay当与此词有连系。由此可见，契丹字“山”（音“讷都”）用于表示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土、戊己”的意思是有充分理由的，其音值当为* nutug。因为契丹语中表示“山”和“土”语词发音相同或相近，所以可借汉字“山”表示“土”。

由此也可以断言，契丹纪年确实使用金、木、水、火、土五行配天干，即甲乙配木、丙丁配火、戊己配土、庚辛配金、壬癸配水。

契丹大字《肖孝忠墓志》称“木龙年”、“木龙月”、“马年”等，其“龙”字字形与女真字的“龙”字（音“木杜儿”）相近，可以确信不误。由此可见契丹亦以十二生肖配地支。

契丹小字“山圣月”义为“己未”。今按“圣”出自汉字“圣”减笔，其音读为“窟”（见《广韵》、《集韵》）、“怪”（见《字汇》）；“月”出自汉字“月”，其音读为“軏”（见《集韵》，鱼厥切）。《龙龛手鉴》中“圣”字作苦没反。据此不难拟出契丹文“未”字字音为* kuainiua (t) 或* k'ue (t) -ŋiua (t)，其意义当为“羊”。试比较古典蒙古语honi（绵羊）、《元朝秘史》honi（羊）honit（羊的复数）、莫卧儿语kóni（羊）、女真语“和你”（羊）、满语honin（羊）、《阙特勤碑》k'oói（羊）、维吾尔语Koy（羊）等词。这也再次证实契丹是以十二生肖配地支。

关于契丹文干支纪年用字的详细释读，另见拙作《契丹文干支名称考》。

三、释契丹文“𡈼山”（升天）——兼论旧译卢纳文《阙特勤碑》突阙汗号之误

契丹文“𡈼口皇帝”（见《故太师铭石记》），重熙二十五年，公元1056年）、“𡈼山主王村”（见《肖氏墓志》，清宁三年，公元1057年；《许王墓志》，乾统五年，公元1105年）均系辽太祖称号。《肖氏墓志》称辽太祖为“大圣升天皇帝”，《许王墓志》称辽太祖为“太祖升天皇帝”。本文仅限于讨论契丹文“升天”二字，其它帝号称呼的释读另见拙作《契丹文墓志所见辽金帝号考》。

契丹文“天”字作“𡈼”、“𡈼”，前者为契丹大字，后者为契丹小字，一望而知出自汉字“天”而字形稍改。契丹大字“天”字又写作“𡈼”，这与女真字的“天”字作“𡈼”极为相近。契丹小字的“天”字则与女真字“𡈼”（音“登”）字形相近，可证后者系借用前者音义而稍变其形。

首先要注意的是：契丹小字“山”与前述“山”（土）字不同，区别在于右上角是否加点。这表明两者音义可能有别，尽管都出自汉字“山”。

其次要注意的是：这个契丹小字与契丹大字“口”等值。今按汉字“口”《玉篇》谓是古文“围”字；《龙龛手鉴》注云：“见大物失声也，又《文字音义》云回也，象围匝之形”；《说文》注云：“回也，象回帀之形”。

根据前述契丹字“山”（土）借用汉字“山”而训读为“讷都”的原则，我们可以同样设想契丹大字“口”系借用汉字“口”而读以契丹语音。

检《元朝秘史》tóor—义为“绕、转”、togor—义为“圆”；古典蒙古语togurig义为“圆”togorin义为“围”，togurih 义为“围绕”。还可以比较满语 tohoro（车轮）、古突厥语tägirä（围绕）、täkrä（围绕）、täksin—（旋转）、täksinc—（圆）、tikilä-（旋转）、tog（旋转、上升）、维吾尔语düglek（圆）、dügilek（圆的）。兹据此进一步假定：契丹大字“口”借用汉字“口”而训读为*togo (r) 或*toko (r)。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今再考虑到古突厥语tog-义为“旋转、上升、日出”(见《阙特勤碑》)、又《元朝秘史》de'eksi (往上)、de'ere (上)、dege'un (从上)、dekdegu (升起)、古典蒙古语degdehu (上升)、degedu (上边的)、dgegur (上面)、degegsi (向上)、degere (上)、degerehi (上面的)、degjirehu (上升)、莫卧儿语dekvi (向上)、dēgu (上、在上)、满语dekdembi (飞起)、deken (稍高)、dekjimbi (长进)等等。可见契丹大字“丞口”本义为“天上”,其中“口”字系取音值*dogo～*doko或*togo～*toko,“天上”二字当读*dengri dogo～*dengri doko或*dengri togo～dengri toko。“天上皇帝”当即匈奴所谓“天可汗”、“撑黎孤塗”。辽太祖谥曰“升天皇帝”,其契丹语源当即“天上皇帝”,所谓“升天皇帝”实系辽代汉人文士根据汉族追谥文例的意译。

因此可以说,契丹大字“口”本义为“上”,其音读为*dogo、*doko、*togo、*toko等,相当于《元朝秘史》的-deki (-daki),用在名词后面表示方位。例如《元朝秘史》:gujuhun deki kundu mudun (颈项上沉重的木头);现代蒙古语亦用-daki加在名词后面构成形容词。据此契丹大字“丞口”本义确为“天上的”,相当于蒙古语tengri deki (天上的)。

既然契丹大字“丞口”(皇帝)即契丹小字“”(皇帝),这就不难看出后者的意义不是什么“天金皇帝”,而是“天上皇帝”!而且,这个契丹小字“山”在契丹语读音也当与契丹大字“口”相同,即读作*dogo、*doko……等等。

考虑到dag～tag在突厥语的意义为“山”(最早见于古突厥文《阙特勤碑》的tag,至今新疆地区还有一些高山沿用此称,例如著名的“穆士塔格山”即其一),由此可以推断:契丹语“山”也叫*dogo、*doko……等等(因为契丹语属于阿尔太语系,契丹语也称“山”为“塔格”是不足为怪的)。

据此可以进一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契丹文借用汉字,音读却不止一个。例如契丹文借用汉字“山”,可以读作“讷都”,也可以读作“塔格”。这样一来,契丹小字“山”就有两个音值:*nutug(讷都)和*dogo～togo(塔格)。为避免混淆起见,契丹文字的设计者就采用区别符号(加点)以资识别:以“山”表示音读*nutug而以“”表示音读*dogo等。

这样看来,《郎君行记》开头两个契丹小字当为“”,其意义不是“大金”而是“皇弟”,因为在契丹语中,“弟”与“”同音,所以共用一个契丹字表示。说详本文第五节。

综上所述,契丹文“天上皇帝”(即汉译“升天皇帝”)音读为*dengri-*dogo(*togo)—*ejen—*gun (关于“皇帝”的契丹语音,另见拙作《契丹文墓志所见辽金帝号考》)。类似的称号亦见于突厥卢纳文《阙特勤碑》。

《阙特勤碑》首称täŋri täg taŋridä bolmiš türk bilgä qagan bu ödki olur-tum,意即“我是天上天生突厥毗伽可汗”,这与《元朝秘史》所谓de'ere tenggeri ece jaya'atu toreksen (上天有命而生的)的含义相近。前文已经论证:所谓“天上皇帝”(升天皇帝)的契丹文“天上”二字音读为*dengri-togo,同时考虑到《元朝秘史》的de'ere tenggeri含义为“上天”,那么上引《阙特勤碑》所谓täŋri täg,当与契丹语*dengri-dogo含义一致。然而历来的考释家自丹麦汤姆逊到苏联马洛夫,都把那句古突厥文译作“我是如天的、天生的突厥毗伽可汗”(顺便指出:马洛夫号称苏联突厥学大师,他的译文开头就漏译“毗伽”二字⑧,其治学不严颇出人意外)。这个“如天的”译得不伦不类,译释者既不明了 Täŋri täg tang-ridä (天上的)是重叠构词,又不汉文熟谙史料,以致译文有失原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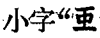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据唐代《毗伽公主墓志》(见《金石萃编补略》)，既有“天上得果报天男突厥圣天骨咄禄默啜大可汗”之称，又有“天上得毗伽可汗”之称。又据《册府元龟》六七七，开元二年默啜上书自称“乾和永清大驸马天上得……可汗”。前人已误解tangri为“果报”，又谬称“果报”相当于“幸运”、“吉祥”之义；更错误的是，日本学者羽田亨竟译tangri bolmiš（天生）为“天上得”⑧。在我看来，其实“天上得果报”就是“天上得”，也就是《隋书·突厥传》所谓的“从天上。“果报”二字不过是汉文墓志的撰者画蛇添足，把佛教术语塞进了突厥汗号，以致引起后人种种议论和误解。然则汉人墓志的撰者译tangri täg为“天上得”，在音义方面倒是远胜今译“如天”，因为“得”字照顾了突厥语词的原音täg（汉字“得”古音tek，与突厥语音täg相近），也照顾了突厥语词täg的词义。原来古突厥语täg-（tog-）可能有几个含义，其中一个含义是“上”，即在词组tangri täg（天上）中的本义；另一个含义是“接近”、“达到”，这便是唐人所理解的词义；还有一个是“如同”，这便是现代突厥学家如汤姆逊、马洛夫等人所理解的词义。《说文》：“得，行有所得也”；《玉篇》：“得，获也”；《韵会》：“凡有求而获皆曰得，又赋受亦曰得”。由此可见，唐人译“天上得”比今人译“如同”更为贴切。过去韩儒林、岑仲勉先生误信外国学者译文，未加精审。如韩译“天所生象天”，直不知云何，岑译同“天天子”，且引“尚书》郑注“稽古同天”为证，也是牵强附会⑨。我们今天应当依据契丹墓志所谓“天上皇帝”之称，还其本来面目。

四、释契丹文“𡱖山”（郎主）——兼论“郎主”、“人皇王”、“海上诗”、“海滨王”、“海陵王”

契丹小字的“郎主”二字，见于《故耶律氏铭石》。辽代天祚帝在《许王墓志》(乾统五年，公元1105年）称“圣孝皇帝”，在《故耶律氏铭石》称“圣孝郎主”。以“郎主”称呼辽金皇帝，虽早有记载，但未详其含义。见此两契丹字碑，方悟“郎主”原义即“四海皇帝”，相当于《元朝秘史》所谓的dalai hagan（海内的皇帝），意即“世界的君主”。兹论证如下。

如前所述，契丹小字“𠂤”义为“上”，其音值为* dogo等，在契丹文的“郎主”二字中则用于表示“主上”，“皇上”。例如满语derge既表“上”和“东”，又表“皇上”。汉字“上”的意义也一样。《广韵》“上”字注曰：“君也，太上极尊之称”。因此说，契丹小字“𠂤”在此用于表示“君主”，这并不难理解。

至于契丹小字“”，已故罗福成先生早已释为“经略郎君”(见《郎君行记》)之“郎”。这是十分正确的。罗福成先生在不明契丹字音的条件下释出契丹文的“郎君”二字，可谓独具灼见。其它中外诸家的所谓解读，不过臆测冥索、削足适履。

今按《道宗皇帝哀册》帝号“仁圣大孝文皇帝”的“仁”字契丹文上半部即，后者的音读为* ngagun或*ngahun（另详拙作《契丹文墓志所见辽金帝号考》）。检《元朝秘史》有na'ur义为“海”，古典蒙古语作Nagur，今义为“湖、池”。与Na'ur、Nagur语音相近的是古典蒙古语Nohur，今义为“爱人”、“朋友”、“同志”，女称男亦曰Nohur。汉俗妇人称夫曰“良人”，例见《孟子·离娄》：“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正义》曰：“良与郎声之侈弇耳。古者妇称夫曰良，而今谓之郎也”。又：《广雅释诂》：“郎，君也”；《礼记·少仪》“仆者右带剑，负良绥申之面”(郑注：“良绥，君绥也”)。据此可以断定，契丹语中“海”与“郎”为同音词，因为有上述古训，所以前人就把契丹女真君主的本族称呼*Na'ur-dogo（直译当为“海”，上意译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当为“四海君主”)译作“郎主”,从而混淆了契丹语“海”与“郎”的词义,致使“郎主”的语源被掩埋千年之久。幸得契丹文墓志之助,今日始明真相。

向读辽代义宗人皇王《海上诗》:“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不解何以称“海上”、何以称“小山”、“大山”、何以称“人皇王”。现在释出契丹文墓志中的天祚称号,才恍悟所谓“小山”、“大山”的“山”,其实是个契丹小字,表示“兄弟”的意思(详见后文第五节);所谓“海上诗”,其实原义是“郎主诗”(史载义宗封东丹国人皇王,赐天子冠服,建元称制,当然可以称为“郎主”即“海上”);所谓“人皇王”,也不过是契丹文的“郎主”的意译。

为什么说“人皇王”的含义是契丹文的“郎主”呢?问题的关键就在契丹文的“郎”字与契丹文的“仁”字字根同为!《释名》:“人,仁也”;《中庸》:“仁者人也”;《礼记》礼运注:“何以守仁曰仁”,释文曰:“仁本亦作人”。古来的注疏就是这样人仁互训的。可以设想:当年的史官通晓契丹文,知道契丹文的“郎”字与“仁”字字根相同,因此才把义宗的本来封号“东丹国郎主”译作符合儒家口味的“东丹国人皇王”。

不过要指出,也许元代的《辽史》编纂者似乎已经完全不明“郎主”即“海上”的原意,于是就根据前代流传下来的所谓“海上诗”,望文生义杜撰了一个“立木海上”的故事,竟把后人蒙蔽了几百年之久。试问东丹王当年投宋之时,为什么要赋诗“立木海上”?这“海上”又何能“立木”?说“海上诗”就是“郎主诗”,岂不是更合情理!

根据“郎主”与“海上”的词源联系,可以判断所谓“海滨王”、“海陵王”,也应当是“郎主”的异译,其语源即*Naˈur-dogo(海上)。辽天祚帝降金以后,并未降封滨海地区,与“海”毫无瓜葛,何以封“海滨王”?金代的海陵煬王也同“海”风马牛,何以史称“海陵王”?

原来契丹语*dogo(上、主)等还有“接近”的含义。例如古突厥语täg-(接触、到达)、tiän-(接近、到达);古典蒙古语dohuhu(接近)、女真语“的哈撒”(近)、满语doko(近)、dokolombi(抄近走、另相亲对)等等。今按汉字“濒”在《集韵》谓是“水际也”;《史记·货殖》:“邹鲁滨传洙泗”,(意指“近”洙泗);《国语·齐语》:“是以滨于死”(意指“接近”于死)。现代汉语“濒临”、“濒行”、“濒危”等词的“濒”,就是“接近”的意思。由此可证所谓“海滨王”就是*Naˈur-dogo(“海上”、“郎主”)的另一译法。

“海陵王”之称或许也出自“海上”(“郎主”)。这个译名似为音义兼译,把它还原当是*Naˈur-rin-dogo,“陵”字即对译满蒙语表示所属关系的后缀(r)in,此语直译就是“海上的”、“海的主”、“海的王”,也就是“郎主”!

综上所述,可见“人皇王”、“海滨王”、“海陵王”、“海上”等称呼的契丹女真语原义都是“郎主”的意思,所谓“郎主”就是“海内皇帝”、“四海君主”。辽天祚帝和金海陵煬王都号称“郎主”,由此可以进一步得出另一重要结论:辽金皇帝的本族称呼之一就是*Naˈur-dogo或*Naˈur-rin-dogo。

五、释契丹字“又山”(皇弟)——兼论“特勤”、“洪台吉”、“皇太极”

前文第三节已经讨论契丹小字“”的意义为“上”、“主”,其音值为*dogo(*Togo)。因为契丹语的“主”、“上”、“弟”等是同音词,所以契丹小字“”又可用于表示“兄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弟”(此即“同音假借”)。例如古典蒙古语deguu（弟)、莫卧儿语dÖwn（弟)、《元朝秘史》de'u（弟)、布里亚特语duu（弟)、喀尔喀蒙古语duu（弟)、我国境内蒙古语duu（弟)、女真语“斗兀温”(弟)、满语deo（弟)、突厥语togan（兄弟)。由此可见,《郎君行记》首二字“爻山”不是“大金”而是“皇弟”的意思。前人释契丹小字“爻”为发语词“维”,并无语言学根据。

今观契丹小字“爻”字形与汉字“冢”相近而笔划简化,其契丹语音读当为*yeke(大)。《尔雅释诂》:“冢，大也”;《周礼天官》:“乃立天官冢宰”,注云“冢宰,大宰也”。又《说文》“皇”字训义为“大”。由此可见，契丹文“爻山”即*yeke-dogo”,其意义为“皇弟”。

《唐书突厥传》称可汗子弟曰特勤，突厥卢纳文“特勤”作tigin（见《阙特勤碑》),疑此与契丹字的“弟”字有词源连系。后世所谓“洪台吉”、“皇太极”也当与此有关，不当附会为“太子”,因为“吉”字的古音为kiet,“极”字的古音为g'iek。所谓“台吉”、“太极”当是“特勤”的音变，在契丹语均为*dogo（*togo)。

六、结束语——兼论解读契丹文字的正确途径

综上所述，可以作出如下结论:

1．契丹字是借用汉字（或用其原形、或用其变形）而训读以契丹语（即用契丹语中与汉字字义相当的语词读此汉字)。例如汉字“山”读以契丹语“讷都”(山);

2．契丹语中表示一个概念可能有几个语词，因此一个汉字可能有几种训读。例如汉字“山”可以训读为“讷都”,也可以训读为“塔格”;

3．这样一来，一个汉字借用为契丹字以后，可能有一个以上音值。例如契丹字“山”的音值有“讷都”、“塔格”等等;

4．为了区别一个契丹字的不同音值，契丹字的创制者即采用区别符号。例如以“山”表示“讷都”的音值，以“山”表示“塔格”的音值;

5．一个汉字借用为契丹字以后，可以根据同音假借的原则用于表示其它意义。例如契丹字“山”(音讷都）表示土”的意义（因为契丹语中“土”的“语音为讷都”)，契丹字“山（音塔格）表示“上、主”、“弟”的意义（因为契丹语中“上、主”、“弟”等的语音为“塔格”);

在我看来，这是契丹文字构造的基本规律之一。当然还有其它的规律,本文限于篇幅,容另文论述。

其次，本文根据对契丹文“山”的解读和相当的语言学证据，对汉文史籍记述的所谓“天上”、“天上得”、“郎主”、“人皇王”、“海上”、“海滨王”、“海陵王”、“特勤”、“洪台吉”、“皇太极”等称谓,作出了一系列论证或推断。这些论证或推断,都还有待挖掘更多的文献史料来证实,在未经别的文献史料证实之前，不过是一种假说,也许是多少有点道理的假说。

元代修纂辽金史草率成书，疏漏甚多，这是众所公认的。因此，现在流传下来的契丹女真字碑，就显得弥足珍贵，如能解读成功，一定可补史籍记载之不足，这是不言自明的。

然而直到目前为止，人们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对契丹文字提出了一些解读方案，也认识了一些契丹字,但是对于契丹文字的构造和契丹语的语音语法面貌,却依然莫名其“妙”。女真文字有《女真译语》传世，研究起来还比较便利，已取得一定成绩，但是仍有不少难于解决的困难。总的说来，关键就在尚不明了契丹女真文字的造字规律。解读契丹文字的正确途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径，就在于：

1．首先必须把契丹女真文字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史籍明言女真大小字系仿造契丹大小字，显然应当利用女真字书，作为解读契丹文字的阶梯⑩。

例如女真字有“”(音“登”)、“”(音“卖”)，与契丹小字“”(意义为“天”)相当，还有一个“”(音“阿卜哈”，意义为“天”)，与契丹大字、相当。这样我们当然可以假定女真字“”(天)出自契丹大字“”，从而进一步设想后者也是“天”的意思，再进一步可以推断，契丹大字的两个“天”字都是借用汉字“天”而增添笔划，然后又再进一步探讨契丹字的“天”的音读。同样，可以假定女真字“”(音“登”)、“”(音“卖”)出自契丹小字“”(天)，因而进一步设想女真字“”得音于契丹语*dengri(天)，再进一步探讨女真字“”为什么音“卖”。

2．史籍记载契丹制字系增损汉字“隶书之半”。因此，必须找出与契丹字形状相同或相近的汉字，再进一步探讨那个契丹字是否汉字训读(或音读)。例如确定契丹小字“”(天)系借用汉字“天”而变形，根据女真字“”音“登”，就可推断契丹语谓天为dengri。

3．必须依据汉文的音韵训诂之学进行分析。例如契丹文“山”(郎主)直译为“郎上”，若不明了古训“上”字为“君主”，自难理解“郎上”的含义。

4．必须依据阿尔太历史比较语言学进行分析。例如在探讨契丹语“山”的语音时，既要依据宋绶《行程录》等所云契丹谓“山曰讷都”，也要同时了解突厥语谓“山”为“塔格”、蒙古语谓“山”为“乌拉”通古斯语谓“山”为“阿林”，然后再依据其它条件确定当取何种语音。

5，必须结合历史进行研究。例如著名的东丹王《海上诗》以“大山”“小山”喻兄弟，足证契丹文“山”释为“弟”可以确信不误；释出“郎主”的契丹字原意为“海上”，足证“人皇王”、“郎主”、“海滨王”、“海陵王”等皆为“海上”(四海君主)的异译。

本文初稿写成于1975年冬，先后承蒙翁独健、熊德基、张政烺、贾敬颜、马雍、张广达等先生提供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附注

① 参阅金梅蕨编《辽陵石刻集录》上下册，1934年，罗福颐：《契丹国书管窥》(载于1949年《燕京学报》第37期)、清格尔太等：《关于契丹小字研究》(载于1977年《内蒙古大学学报》第四期)。

② 见《辽陵石刻集录》卷四、《契丹国书管窥》。

③ 1956年山路广明发表《契丹制字研究》，总结了他的研究成果。

④ 60年代苏联科学院人种学研究所和全苏科技情报研究所合作，试图用电子计算机解读契丹字，1964年9月苏联塔斯社并曾报导这一消息，当年苏联科学院院长凯尔迪什还向第七届国际人种学家大会加以宣扬。参与这项工作的苏联学者有普洛布斯特(М、А、Пробст)、斯塔里科夫(В、С、Стариков)、纳捷里亚耶夫(В、М、Наделяев)、阿拉勃夫(В、М、Арабов)夫妇等人。所著有《解读契丹字的初步报告》(1964年)、《契丹字索引》(1964年)、《契丹字解读资料》(1970年)等。《契丹字解读资料》上卷分析了所谓契丹语结构学，下卷分析了所谓契丹语形态学。

⑤ 见《内蒙古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第74、76页；《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第384、386页。

⑥ 《关于契丹小字研究》一文值得商榷之处甚多。例如所释“四字功臣”、“六字功臣”、“八字功臣”等，依照契丹文原来的顺序则是“功臣字四”、“功臣四字”、“功臣字六”、“功臣八字”。其中只有“四”、“六”、“八”三字可靠。单从语言学观点来看，为什么同一《许王墓志》用字如此随便？难道契丹语的数词用法特殊，竟有时置于量字之前(如“四字”、“八字”)、有时又置于量词之后(如“字四”、“字六”)？

⑦ 疑史书此“孤塗”二字系“塗”倒误，后者与*togo读音正合。

⑧ 见马洛夫：《古突厥文文献》(1951年)第33页。

⑨ 参阅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

⑩ 日本丰田五郎撰有《契丹隶字考》一文(见1963年《东洋学报》46/1)，其副题即称“女真文字源流考”。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